

蔣經國的一九六四： 日記中的家事與國事

林孝庭*

壹、前言

日記是一種自我凝視與內部觀照的過程，撰寫日記有助於理解自己與周圍人、事、物之間的互動；日記的記載有著極為強烈的個人主觀性質，故無法與客觀的具體事實全然劃上等號，然而透過日記內容的呈現，吾人仍可試著掌握當事人對於許多重要議題的內心想法，如果寫作者又是國家重要政治人物的話，則以其私人日記為研究對象，輔以其他相關檔案文獻，必能更加精確地重構與映照出重要時事，對治史者而言，日記因而向來是研究歷史的一項重要素材。

本文以蔣經國民國 53 年（1964）日記為基礎，輔以其他中、英文史料而完成，目的在於透過對小蔣日記之爬梳與研析，來思索日記中所呈現的家事與國事。為何選擇 53 年（1964）？回顧歷史，38 年（1949）底於風雨飄搖之中倉皇播遷來臺之後，經歷十餘年的耕耘，整個民國 50 年代統轄臺、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可說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黃金時期，拜東、西方冷戰對抗之賜，臺北的國府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獲得以美國為首全球反共陣營的支持，外交上，國府退守海島一隅卻得以維持著「聯合國五強」的虛幻表象；內政上，在威權體制

*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

運作下，國府領導人打著「國家安全」的大旗，對民間社會維持著有效的統治，反對勢力的聲音在島內幾乎銷聲匿跡，經濟上，自民國 50 年代起，臺灣的經濟體質從以農產品出口為大宗逐步發展轉型成為輕工業，以出口成長帶動經濟成長，社會開始富裕起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導致 54 年(1965)春天美國政府決定終止對臺經濟援助，這段時期臺灣也從相對閉鎖的經濟格局逐步跨進更廣闊的全球經濟圈之一部份。

然而在民國 53 年(1964)這一年，許多重大事件接連發生，對於日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治理格局帶來深遠影響。這一年的蔣經國，身上前後扛著兩個職銜，一是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主任委員，一是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副部長，而在「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下，小蔣還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在當時副總統陳誠健康狀況高度不佳的情況下，已躋身黨政決策核心之內的蔣經國，受到父親蔣介石之栽培並準備於日後接班，幾已沒有懸念，其在日記裡所揭露的諸多秘辛與個人想法，對於吾人理解發生在當年的諸多重要事件之原委，並讓戰後臺灣歷史置於更寬廣的歷史脈絡下來觀察，當有所助益，這即是本文撰寫之主要目的。

貳、偉人形象陷危機：一部必須被封殺的回憶錄

日記的撰寫在本質上屬於私密性質，即便身為公眾人物，蔣經國在日記上所談者，免不了會涉及家務事。在探討民國 53 年(1964)中華民國臺灣究竟發生什麼重要事件之時，或許可先從兩蔣父子的「家務事」談起。爬梳該年蔣經國日記，吾人注意到那一年開春後不久，即發生了一件令父子倆心神不寧的私事；二月間，臺北高層透過來自美國的訊息得知，民國 10 年代曾與蔣介石同居七年的陳潔如，由在定居香港的李蔭生、李時敏兩兄弟代筆協助下，完成一部 425 頁、10 餘萬字的英文回憶錄手稿，並已於該年初和美國商人希爾(Lawrence E. Hill)簽約，由陳授權後者於四個月內出版這本回憶錄，標題暫定《我作為蔣介石夫人的七年》或者《蔣介石

的崛起》，陳保證「內容全部屬實」。¹

蔣介石與陳潔如同居，時在民國 10 至 16 年(1921-1927)。16 年(1927) 12 月 1 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事前老蔣瞞著陳潔如即將與宋美齡結婚之事，要陳前往美國留學以提高她的文化水準，並應允五年後接她返國，恢復兩人的婚姻關係，對她永不遺棄，結果該年 8 月間，陳潔如離滬赴美後不久，蔣介石即在宋美齡家人要求下於報紙刊登啟事，宣稱與陳潔如毫無任何婚姻契約關係，作為蔣、宋結婚之前提條件，陳潔如的「蔣總司令夫人」身分地位立即陷入萬分尷尬；在美國待了五年之後，她於 22 年(1933) 回到中國，38 年(1949) 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後，陳繼續留在上海，50 年(1961) 在中共總理周恩來批准下，移居香港。²李蔭生與李時敏的父親名叫李博，是澳洲雪梨的華僑富商，曾資助孫中山革命，李家於民國 10 年代遷居香港後，結識了在廣州革命運動的蔣介石與陳潔如，傳聞李時敏還曾經擔任過蔣介石的英文教師，對蔣早年放浪形骸的私生活相當熟知，無怪乎蔣介石於臺北得知陳潔如在李時敏協助下準備出版回憶錄，內心焦慮萬分，心神不佳，曾在日記裡寫道「有某女要在美國出書，對我家謗毀之所為，此又一不測之隱痛，惟其事在卅五年以前，雖捏造誣謗，亦不致遭受重大影響，此乃共匪屢年來無所[不]用的卑劣陰謀之一小插[曲]，只有置之不理而已。」³

蔣經國顯然比他父親更早即已掌握此事，並為此而憂心忡忡，早在民國 48 年(1959) 夏天，小蔣即接獲李時敏自香港來函，信中並附有陳潔如之信，因無人可商量，難以決定處置辦法而令小蔣「深感困擾」，想必與寫回憶錄之事有關，小蔣自我安慰一番寫道「不過天下之事，無論是大是小，

¹ Chen Chieh-ju, *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The Memoir of His Second Wife*, Ch'en Chieh-ju (Boulder, CO: Westview, 1993), pp. xvi-xvii.

²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6), pp. 64-79; Hannah Pakula,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pp. 177-180.

³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藏(以下省略)，《蔣介石日記》，1964 年 2 月 17 日。

沒有不能解決的。」⁴此案隨後不了了之，然而過了將近五年之後，此事又再次浮上檯面；53年（1964）2月15日是農曆大年初三，當天上午蔣經國出門拜年返家後，即接獲陳潔如準備在美出書的消息，他趕緊把留俄同窗好友、後來加入軍統情報部門的王新衡找來商量解決辦法，在小蔣的認知裡，李時敏顯然認定國府高層不欲讓蔣、陳過去這段不堪回首的交往過程曝光，因而有意透過這部書稿準備向臺北勒索，敲一筆竹槓，他不禁痛批「李某採取最卑鄙之手段，得寸進尺，不斷設法謀害，此案發展至此，非作斷然之處置不可。人心之惡毒如此，如何不使人寒心而痛恨？人與禽獸相異之處何在？不如禽獸者多矣。」⁵此時蔣經國因糖尿病情況加劇，父親要他前往梨山靜養兩個星期，為了應付此事，小蔣於離開臺北前夕特地拜訪律師江一平，以及與他素來不睦的孔令侃，江曾任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據傳曾是當年蔣介石與陳潔如結合的「證婚人」之一，38年（1949）後自大陸來臺，小蔣認為由江一平出面處理此棘手事，應頗為合適，鑒於此案最後恐怕必須花費一筆不小的「封口費」才能擺平，小蔣自然也想到財力雄厚的孔令侃，希望孔於必要時能在財務上助一臂之力。⁶

蔣介石並不知悉兒子已在設法解決此案，因此兩週之後當小蔣結束休養、父子倆於臺中見面並首次談到回憶錄之事時，老蔣驚訝兒子其實早已有所掌握，只因不願他分心，所以未敢相告，蔣經國則自記對於「如此小事，為兒者未能為父分憂，而得到妥善之處理，惶愧無已，除對此事將妥作處理外，不得不嘆人心之險毒矣」，父子倆估計陳潔如所要求的金額大概不會太多，因而樂觀認為此案應可在未曝光的情況下，及早落幕。⁷不料到了三月中旬，有關陳潔如回憶錄即將問世的消息，竟開始在美國新聞媒體圈內廣為流傳，舊金山《世界日報》於3月17日發表一篇評論文章，稱陳的回憶錄內容如何，無從揣測，男女私情原極尋常，不過蔣介石自命為中國領袖，顯赫將近四十年，其人格如何，待人接物如何，真偽如何，陳潔

⁴ 《蔣經國日記》，1959年7月16日。

⁵ 《蔣經國日記》，1964年2月15日、2月22日〈上星期反省錄〉。

⁶ 《蔣經國日記》，1964年2月23日。

⁷ 《蔣介石日記》，1964年3月5日；《蔣經國日記》，1964年3月5日。

如既與蔣同居有七年之久，必能說出不少真實情形。向來維護父親「偉人形象」不遺餘力的小蔣，獲報之後憤怒不堪，自認他無法以常規想法來決定對付小人的方法，為此他竟然整夜未眠。⁸

在蔣經國指示下，外交部長沈昌煥電令駐美大使館，欲透過駐外館處交涉兩種可能之解決辦法，一是向出版商收買回憶錄版權，使之無法在社會上流通，二是以「毀謗友邦元首」為理由，請美政府「取締」該書，駐美大使館人員諮詢美方律師之後回報稱，如欲收買版權，恐演變成鉅額勒索交易，然當事人如認其名譽因譏謗而遭受損害而欲提起訴訟，往往程序繁複，曠日廢時且得不償失，且美政府對此類書刊並無依法取締或者防止出版之權利。⁹小蔣獲報後，頓感手足無措，對於遲遲無法替父親解決此案也感到惶愧萬分，他最擔憂的則是海內外政敵恐將利用此書內容，來詆毀父親形象以及反政府的重要題材。¹⁰與此同時，海外媒體得知陳潔如有意出版回憶錄的消息之後，開始跟進報導，內容不乏蔣介石當年如何對陳潔如始亂終棄，以及蔣介石娶宋美齡的政治動機等等，在民國 50 年代的時空背景下，此類有關老蔣私生活的負面描述，堪稱是前所未見，對於其在海外廣大華人社會的崇高聲望造成不小傷害，老蔣內心煩悶苦惱，痛批李時敏「恩將仇報」，同時對於未能及早處理安置，導致今日無法收拾之局面，也感到懊悔莫及，小蔣內心同樣不好受，自認像是有一塊大石頭壓在心頭，令他日夜不安。¹¹

兩蔣父子與幕僚人員經過一番磋商之後，認為阻止陳潔如出書一事無法循官方渠道解決，因而決定改由陳立夫與孔令侃以私人身份來處理。陳立夫的叔父陳其美與蔣介石是結拜兄弟，關係至為密切，民國 5 年（1916）

⁸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頁 352；《蔣經國日記》，1964 年 3 月 24 日。

⁹ 「駐美公使江易生呈外交部長沈昌煥」(1964 年 4 月 16 日)，轉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頁 353-355；周谷，《外交秘聞：一九六〇年代臺北華府外交秘辛》(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 年)，頁 295-296。

¹⁰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4 月 17 日、4 月 22 日。

¹¹ 《蔣介石日記》，1964 年 4 月 30 日；《蔣經國日記》，1964 年 3 月 5 日。

陳其美遭暗殺後，蔣介石提攜陳的兩個侄兒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進入政壇，二陳後來皆成為國民黨內要員，在私人領域方面，16年（1927）夏天，蔣介石即是透過陳立夫來向陳潔如談判「暫時分離」與出國事宜，此後數十年間，陳立夫與陳潔如依然有書信聯繫，如今出版回憶錄之事鬧得沸沸揚揚，老蔣自然需要陳立夫來出面。陳、孔兩人警告受陳潔如委託出版的美國商人希爾，應對該書內容有無涉及誹謗與人身攻擊進行仔細查證，並威脅貿然出版之後所可能引發的法律責任，此舉一時之間頗有效果，讓書商暫時停止出書舉動，然而陳、孔也向兩蔣父子建議，根本解決之計仍在於臺北派人前往香港，與陳潔如當面溝通此事，鑒於該案遲遲無法解決，蔣介石心情惡劣至極，此後更表示將不再直接過問此事，以免他聽了諸多報告之後「刺激不能受」。¹²

年邁的蔣介石既不願再面對這樁陳年往事，處理此案的重擔自然落在蔣經國身上，然而在陳立夫與孔祥熙提出解決途徑（即派員赴香港見陳潔如）之後將近半年時間，此案卻陷入膠著，美國出版商雖未立即讓回憶錄問世，臺北派人前往香港的提議卻也得不到對方回應，直到該年秋天，情況才有所進展；蔣經國於10月27日自臺北拍發電報給人在紐約州的陳立夫，稱他已派律師江一平前往香港與陳潔如、李時敏見面並謀求解決之道，小蔣自記為解決此事，他不惜向人忍辱低頭，感嘆「人心之險惡如此，如何不使我寒心？」¹³江一平在香港待了三個多星期與對方周旋，吾人雖無法清楚知悉整個實際談判過程究竟如何，然透過小蔣日記所載，可知李、陳的態度反覆無常，讓在臺北等候結果的蔣經國，心情像是洗三溫暖，坐立難安，他自忖無論如何一定要解決此案不可，否則每日要為此而分心，既有損工作，而又害其健康。¹⁴

江一平帶著陳潔如開出的條件，於11月19日自香港回到臺北，至於條件內容為何，蔣經國在日記裡並未詳載，僅寫道當他讀到江帶回來的這

¹²「駐美公使江易生呈外交部電」（1964年4月28日），轉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頁360-361；《蔣介石日記》，1955年5月5日、5月7日。

¹³《蔣經國日記》，1964年10月28日。

¹⁴《蔣經國日記》，1964年11月6日、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8日。

份「狂妄要求」時，內心苦痛之深，惟有自己知道。¹⁵根據陳立夫晚年回憶，孔令侃隨後替蔣家支付 15 萬美元給陳潔如，陳則簽字具結保證不會出版回憶錄，還讓江一平把回書稿以及蔣介石早年寫給她的多封情書一併攜回臺北，陳於民國 60 年（1971）去世之後，在香港留下兩處價值不菲的地產，這應當也是該年兩蔣父子所答允條件的一部份。¹⁶此案於 53 年（1964）前前後後鬧了將近一年，最終如兩蔣父子所願，沒有讓陳潔如的書出版問世，不過一份原本即已在美國境內的回憶錄英文打字稿，卻於多年之後輾轉由胡佛檔案館收藏，並於 79 年（1990）出版問世，此時距離老蔣離世已超過十五年，小蔣也已在兩年前去世。蔣經國的一生，一直在竭盡所能維護其父親的神聖形象，然此案的發生，充分顯示維繫此種形象的代價何其高昂，一旦臺灣威權體制不再，偉人神話的解構也將無可避免。

叁、外交危機的出現：日本與法國

民國 53 年（1964）新年伊始，兩蔣父子首先面對的是來自外交方面的嚴峻挑戰。日本首相池田勇人（Hayato Ikeda）於 49 年（1960）上任後，致力於修正與解決已陷入矛盾困境的對華政策，欲藉由國際社會壓力來迫使蔣介石放棄對中國大陸主權之要求，逐步向「一中一臺」政策傾斜，並尋求在不犧牲臺日關係的前提下，打開日本與中國大陸的交往之門。¹⁷ 52 年（1963）間，日本內閣以「政經分離」原則批准向中共出售一座人造纖維廠，並透過日本官方進出口銀行向中共提供兩百萬美元融資貸款，該年 9 月池田首相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公開聲稱蔣介石反攻大陸政策，毫無事實根據，近乎幻想，一個月後北京派出一個油壓機械考察團前往日本訪問，團員周鴻慶脫隊逃往蘇聯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未果，遭日方拘留，當周表

¹⁵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1 月 19 日。

¹⁶ 陳立夫，《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憶錄》（臺北：近代中國，2005 年），頁 631；王月曦等著，《兩代蔣母與蔣家父子》（臺北：傳記文學，1998 年），頁 45。亦有謂臺北方面前後共支付十七萬美元給陳潔如，參見 Chen, 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p. xviii.

¹⁷ 陳鵬仁，《近代中日關係史論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頁 330-333。

達希望投奔臺灣時，卻遭日本政府以「於法無據」為由而拒之，國府當局對於池田內閣一連串不友善的舉措，憤怒異常，蔣介石甚至召回駐日大使張厲生，以示最嚴重之抗議。¹⁸

民國 53 年(1964)元旦，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將把周鴻慶遣返中國大陸，消息傳到臺北，蔣經國內心憤恨不已，自記「想到父親與國家因周案而所受到的恥辱之重，內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痛。」¹⁹國府當局除進一步把駐日公使張伯謹並也召回、並批准張厲生請辭大使職務之外，還下令公營事業禁止採購日貨與暫停兩國之間的官方貿易，臺灣民間也出現抵制日貨運動，並曾發生抗議群眾衝入日本駐臺北大使館等不幸事件，直到二月下旬，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前來臺灣與蔣介石會晤，檢討亞洲反共局勢，認為欲謀求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必須增加臺、日之間彼此瞭解與真誠合作，雙方共同發表《吉田書簡》，日本重申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才獲得緩解。²⁰

就在周鴻慶於 1 月 14 日被日本遣返中國大陸的同一天，兩蔣父子接獲來自美國的情報消息，稱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準備承認中共，這不啻是外交上對國府另一個沉重打擊。當時華府情報顯示戴高樂已決定與北京建交，並將在該月底對外宣布，只不過戴高樂尚不願接受中、法建交必須與臺北斷交的條件，除非臺北主動與法國斷交。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得知此訊息後甚感氣憤，認為法政府不顧美國全球利益，高唱「戴高樂主義」以展現外交獨立自主，並與華府抗衡，國務院立即向臺北施壓，要求審慎考慮聯合國內法語系非洲國家動態，不可冒進與巴黎斷交，並要國府克制內部反法言論與行動，利用臺、法尚未斷交的模糊狀態，考驗北京是否會與法國互派大使。²¹蔣介石認定國務院這番籲請乃

¹⁸ 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 年），頁 195-197；戴天昭著，李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 年），頁 571-573。

¹⁹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 月 1 日。

²⁰ 林金莖，《戰後中日關係之實證研究》（臺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4 年），頁 203-206；戴天昭，《臺灣國際政治史》，頁 573-574。

²¹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美方執意推動「兩個中國」政策，他自認三年多前在處理外蒙加入聯合國一案時，臺北最後一刻未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讓外蒙得以入會，已做出巨大讓步，如今要他再次違背「漢賊不兩立」國策，簡直無法忍受。²²

蔣經國此時雖未參與諸多重大外交危機事件的決策過程，然在他看來，周鴻慶遭日本遣返以及法國即將承認中共這兩起事件的發生，顯示整個國際局勢對臺灣已產生不利的變化，他認為國府上下在心理與精神上應有所準備，並在外交上作必要之打算。²³小蔣所不知的是，數日之後，他竟然意外地擔負起處理臺、法斷交爭議的重要角色，蓋此時華府為了規勸臺北不要主動與法國斷交，在詹森總統拍板同意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敦請曾於民國 47 至 51 年（1958-1962）間擔任中央情報局駐臺北站長、時任中情局副局長的克萊恩（Ray S. Cline）親自出馬，希望利用他派駐臺北期間與兩蔣父子建立的深厚情誼，對國府高層曉以大義。²⁴克氏當時正在歐洲公差，美方動用三架運輸機，把在旅途中的克氏緊急送往臺灣，其座機在琉球群島上空還因天候不佳，險遭空難，經過一番折騰，克氏於 1 月 26 日清晨四時抵達松山機場，一夜未眠的蔣經國見到老友後，立即把他接回寓所進行長談。²⁵克氏隨後與蔣介石晤談，當面勸告國府當局應與巴黎周旋到底，讓戴高樂負起背信之責，不要貿然宣布斷交，這段期間華府將全力製造輿論壓力，使北京與巴黎無法建立起全面外交關係，藉以減少其他國家跟進的可能性。兩蔣父子很清楚美國正在依其自身利益而提出要求，並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24-525; H.W. Brands, *The Wages of Globalism: Lyndon Johnson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88-92.

²² 《蔣介石日記》，1964 年 1 月 25 日、〈上星期反省錄〉、1 月 26 日。

²³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 月 15 日。

²⁴ 華府對於克萊恩能否勸阻臺北暫勿與法國斷交，並無太大把握，但認為克氏若能與蔣氏父子親自晤談，將有助於美方理解其想法，參見 State Department to U.S. Embassy in Taipei, January 24, 1964, 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以下簡稱 DDRS)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2013-), no. CK2349564430.

²⁵ Ray S. Cline,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Council, 1989), pp. 109-114;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 月 27 日。

非真心顧及臺灣立場，然最後仍勉強同意聽從建議，並未在臺北時間二十七日晚上戴高樂宣佈與中共建交時主動斷交，僅抗議法政府嚴重損害中華民國權益，違反聯合國憲章基本精神。²⁶

此一「雙重承認」狀態持續兩星期，直到2月10日戴高樂訓令法國駐臺北代辦薩萊德（Pierre Salade）轉告國府當局，告以一旦北京派遣之大使抵達巴黎後，法政府將視其為唯一代表中國，屆時將不再承認來自臺北的大使，老蔣認定法方此舉足以昭告世人，戴高樂必須承擔斷交之責，同時也可向華府表達自己已盡最大努力配合美方政策，遂於當晚宣佈與法斷交。²⁷事實上，兩蔣父子對於詹森施壓要求臺北配合行事，私下痛罵不已，老蔣甚至認為美方政策之「卑劣」尤甚於法國，小蔣則向克萊恩抱怨美國「不守信用、欺善而怕惡」。²⁸儘管如此，在華府看來，克萊恩此行仍成功執行美政策，迫使戴高樂展現出為了與北京建交，他必須以犧牲與二戰時期曾經並肩作戰對抗軸心國的國府盟邦關係為代價，此一結局對於美國全球戰略整體佈局，仍屬有利。²⁹

臺、日外交風波與臺、法斷交事件所突顯之重要意涵，在於國府遷臺以來，拜全球冷戰對峙之勢所得以維繫之「代表全中國」正統地位，到了民國53年（1964）之際已出現結構性的危機，然國府高層卻依然堅持其立場，未能作出應變。周鴻慶停留東京期間態度反覆無常，先說他想去蘇聯，在國府駐日外交人員積極遊說後，又表示願意前往臺灣，接著考量到家人安全問題後，他改口表示希望前赴臺灣以外的第三國，然當北京當局表示不會追究其在東京言行之後，周又決定回到中國大陸，甚至開始絕食以向

²⁶ 翟強，《冷戰年代的危機和衝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頁126-127。

²⁷ 《蔣介石日記》，1964年2月10日；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202。

²⁸ 《蔣介石日記》，1964年2月10日；《蔣經國日記》，1964年1月29日、2月1日、2月2日。

²⁹ Memorandum for McCone by Cline, March 2, 1964, enclosed in McCone to Rusk, Bundy, and Harriman, top secret, March 2, 1964,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Reading Room, Records obtained by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quest (簡稱 CIA/FOIA), no. 0000864573.

日方表達其希望回到中國的堅決態度。³⁰面對這樣一位搖擺不定的投機無賴，國府當局竟將其所衍生的爭議視為頭條大事，在交涉過程中立場強硬，甚至擺出一副不惜與日斷絕邦交的高姿態，殊不知驅使日方決策背後更深層的思維，乃在於對「臺北代表全中國」此一虛幻表象的不滿與抗拒，欲尋求打破此種外交框架，以更務實的立場處理對華政策，事實證明，雖然臺、日雙方的不快隨著吉田茂的來臺訪問而暫告落幕，然該夏天日本政府正式同意中共官方所派遣之五名貿易代表常駐東京，首相池田勇人更公開聲稱未來日本的亞洲政策，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問題為重心，臺、日邦交發生質變，已有跡可循。³¹

臺、法斷交事件過程當中，同樣呈現出國府高層對於自身政權法理性與代表性，在現實與虛幻之間所開始出現的巨大鴻溝，無法加以妥善應對。斷交前夕戴高樂轉達給臺北的口信之一，即在於法國無法將已統治有六億人口的國家（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永久排除在外，巴黎當局以現實主義外交政策來處理中國問題，兩蔣父子不會不清楚此點，然而面對危機，卻只能訴諸道義與情感，希望戴高樂念及二次大戰期間國府向其所領導之「自由法國」陣營伸出援手等往事，要求法方暫緩考慮與北京建交，否則「此舉不但要對法國國家歷史與人民負責任，並且對後代子孫又將如何交代？」³²而當美政府透過克萊恩勸導國府採取現實立場對應法、中建交案，不要單純訴諸「漢賊不兩立」的道德制高點時，蔣經國反而對美方此種「害人又害己」的對華政策痛加指責，並稱「如不徹底改正，美國必將自遭失敗。」³³此後短短不到兩年內，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自陷孤立，讓臺北的外交空間有了一段喘息的機會，讓真正嚴酷挑戰的來臨，又拖延了數年之久，儘管如此，發生在民國 53 年（1964）初的這兩起外交事件，似已預示國府的外交逆流，終將無可避免。

³⁰ 中共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77-80 期（2001 年），頁 180-182。

³¹ 翟強，《冷戰年代的危機和衝突》，頁 121-123。

³² 《蔣介石日記》，1964 年 1 月 20 日。

³³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2 月 2 日。

肆、軍事挑戰：湖口兵變與中共核試爆

外交與內政往往是一體之兩面，當中華民國的外交接連發生危機之時，臺灣內部的民心士氣肯定也將出現浮躁與不安。民國 53 年（1964）1 月 21 日早晨，新竹湖口陸軍裝甲兵第一師進行年度裝備檢查，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在對受檢部隊訓話時，突然言辭激烈攻擊政府，聲稱政府沒有能力處理外交問題，日本與法國爭相討好中共，國家陷於孤立，且軍方高級將領貪腐嚴重，蔣介石總統已被小人包圍，必須「清君側」云云，接著他要官兵隨他出發前往臺北去清掃「總統身邊的壞人」，以保護「總統與國家的利益」，趙志華發言之後，遭到反應機靈的裝甲兵政戰人員當場制伏，部隊隨後遭接管，蔣經國獲報後緊急下令封鎖湖口前往臺北主要交通幹道，並命令軍方相關單位於必要時對企圖北上的裝甲部隊進行攔截，整起事件最後在趙志華遭到逮捕之後落幕。³⁴

趙志華企圖煽動裝甲兵叛變之時，兩蔣父子正在石牌榮民總醫院陪伴宋美齡進行割除膽囊手術，雖然該事件只能算得上是趙一個人的「口頭政變」，然而兩蔣父子卻不敢大意，蔣介石除下令徹查趙某的謀反動機，以及是否背後有中共支持之外，還要蔣經國將事件之來龍去脈轉告美方，並著手整頓裝甲兵部隊人事。³⁵由於趙志華與卸任裝甲兵司令一職不久的蔣緯國關係密切，此案之發生不免也牽連到蔣緯國日後的仕途發展，蔣經國即不只一次批評緯國，稱「今日發生此事，極為不幸，余曾多次勸弟遠離東北籍的小人集團，未能見效，不但為之可惜，而且恐怕再有類似之事發生。」小蔣雖立即把弟弟找來懇談，然而結果卻令他感到失望，自記「緯弟必須在這一方大下決心，否則他的前途是很危險的」。³⁶

³⁴ 汪士淳，《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臺北：天下文化，1996 年），頁 160-179。

³⁵ 《蔣介石日記》，1964 年 1 月 22 日、1 月 23 日、1 月 24 日、1 月 25 日。

³⁶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 月 21 日、1 月 22 日、1 月 24 日。

湖口裝甲兵事件乃趙志華不滿時政之個人舉措，然其所透露出來的一個深層意義，在於國府遷臺將近十五年之後，到了民國 53 年（1964）之際，國軍部隊在蔣介石震耳欲聾的「反攻大陸」國策之下，已難以繼續維持在高度備戰狀態，久而久之，內部紀律必然逐漸鬆弛敗壞，士氣低落，誠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內部文件所披露，鑒於當時全臺一千兩百萬民眾之中，外省籍人士僅有一百五十萬，而真正渴望光復大陸的甚至只有那數百名國府軍政官員，儘管此番評論是否過於誇張，然對國府當局而言，如何讓一支本省人已占多數的國軍部隊，繼續相信反攻大陸乃為其最優先目標，確實已非容易之事。³⁷該年春天接任國防部副部長的蔣經國，於各地視察部隊狀況時，即在日記裡透露出其對臺灣軍事戰力的高度擔憂，發現部隊「造假作偽，專做表面和應付工作，軍事訓練不注重實戰，政治教育則只有形式而不注意實效，高級官與下級官之生活脫節，官兵之間根本無感情可言，部隊長對國防部多表不滿，為了要使部隊有堅強的戰力，非下決心切實加以整頓不可，否則必將不堪設想。」³⁸小蔣觀察到當時國軍部隊由上而下，風氣與作法已經開始腐化，國防部以及各總部之高級將領為了個人前途，不惜用欺騙和收買的卑鄙手段來達到其目的，他焦慮地感慨，如再不加緊革新，部隊將不能作戰。³⁹

民國 53 年（1964）之際，已擔任國防部長長達十年的俞大維因健康不佳而赴美就醫長達數月之久，蔣經國以副部長身份實際主導臺灣軍事大計，然當他愈加深入各地基層部隊瞭解實際狀況，他的憂慮感就愈深。該年 6 月上旬，在事前未通知部隊長官的情況下，小蔣突擊視察臺北附近的幾個單位，以求能夠親睹基層部隊的實況，其心得是「雖尚不能說已經腐爛，不過到處可以看出破爛的現象，欺騙和造假是今日軍中之最大弊病，自上

³⁷ 此類評估，另參見 CIA Special Report, "Taiwan's Morale Problem," January 22, 1965, in Paul Kesaris ed.,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1946-1976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 1982), microfilm reel 2.

³⁸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4 月 14 日。

³⁹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5 月 4 日。

至下，幾乎已成了習性，可畏！」⁴⁰同月下旬，他又循同樣模式獨自一人臨時前往視導臺灣南部多個軍事單位，除了左營的海軍陸戰隊新訓中心情況稍好之外，小蔣自記「其餘各單位莫不鬆懈衰敗，並且處處可以看見作偽造假之情況，如不再痛下決心從事全面改革，我想過不久就會腐化而不可收拾。」⁴¹然而此時臺灣部隊已有士兵年齡老化的結構性不利因素，加上民國 38 年（1949）以來國軍久經訓練而未作戰，士氣難以維持，蔣經國甚至理性地將兩岸之間的軍力實際狀況，作一對比，暗自稱讚共軍「訓練的特點是細緻、實際、嚴格和徹底，而我軍之特點恰好相反，那就是粗率、空洞、鬆弛和敷衍。如不能徹底覺悟加以改正，真不堪設想。」⁴²

事實上，冷戰時期國府最重要盟邦美國所採取之策略，在於利用臺灣作為圍堵亞洲共產主義的前哨站，同時極力避免捲入臺海戰事，在此情況下，蔣介石欲片面發動反攻行動成功的機會極為渺茫，而讓國府「反攻大陸」神聖使命成為一場毫無實現可能之夢的關鍵因素，則是民國 53 年（1964）秋天中共成功進行首次核試爆；47 年（1958）第二次臺海危機發生時，美政府曾威脅要以核武對付中共，這讓北京當局深刻體認到自主研發核武的迫切性，不久之後中共正式啟動原子彈研製計畫，以位於北京的核武器研究所為大本營，從理論設計、中子物理、放射化學、結構設計與引爆控制系統等各方面，加緊進行研發工作。⁴³51 年（1962）年 3 月，北京首次試射東風二型導彈之後，華府擬妥一新方案，決定推動跨部會行動，在情報、外交與新聞宣傳各方面密切聯繫，努力淡化中共核試爆在國際冷戰與美國反共外交政策上所帶來的負面衝擊。⁴⁴隨著國際社會對於中共核武研發進

⁴⁰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6 月 10 日。

⁴¹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6 月 20 日。

⁴²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8 月 10 日。

⁴³ 賈俊明、董學斌著，《倚天—共和國導彈核武器發展紀實》（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 年），頁 60-74。

⁴⁴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以下簡稱 NARA), Record Group (以下簡稱 RG) 5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Decimal Files, 793.5611/9-2462, George McGhe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to Robert Mann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0, 1962.

程的高度關注，由臺灣空軍 U-2 高空偵察機「黑貓中隊」所執行的中國大陸空中偵察行動，成了西方國家情蒐中共核武設施與裝備地點的重要來源，52 年（1963）夏天，「黑貓中隊」所拍攝取得中共在西安、包頭與蘭州等地的核武設備照片，甚至成為美政府研判北京核武進程的最直接證據來源。

45

面對中共極可能在不久之後躋身核子俱樂部成員，國府高層的焦慮與不安，可以想見。民國 52 年（1963）秋天蔣經國銜命訪美，與包括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內的華府政要會晤溝通，積極爭取美方支持父親蔣介石的反攻構想，9 月 10 日，蔣經國在白宮與甘迺迪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有一番坦率的意見交換，他稱國府當局既已掌握中共原子彈部署與相關核子設備之確切地理位置，因此願意與美方討論利用適當的手段與途徑，「移除或破壞」中共核武相關設備，臺北方面將承擔所有政治與外交上的責任與風險，蔣經國只要求美方提供技術支援。蔣並向彭岱強調，中華民國無意升高臺海危機，醞釀成另一場世界大戰，但中共必須要能夠被有效嚇阻，以免其成為破壞世界和平之巨大威脅。彭岱則向蔣經國重申，華府向來關注中共核武研發進程，他保證美方將謹慎評估國府所提之任何方案，共謀合作以打擊中共的核武發展。⁴⁶

此番晤談之後不久，甘迺迪旋遭暗殺身亡，詹森繼任總統之後，華府高層意識到欲以激烈手段阻止中共發展核武，已不切實際，尤有甚者，部

⁴⁵ Memorandum entitled “Summary and Appraisal of Latest Evidence on Chinese Communist Advanced Weapon Capabilities,” by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top secret, July 10, 1963, NARA, RG 59, Executive Secretariat Country Files 1963-66, Box 2. 有關「黑貓中隊」執行空中偵察任務的這段歷史，可另參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室，《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編印，2010 年）；沈麗文，《黑貓中隊—七萬呎飛行紀事》（臺北：大塊文化，2010 年）。

⁴⁶ CIA minutes of meeting, Subject: Meeting between Mr. McGeorge Bundy and General Chiang Ching-kuo, September 10, 1963, CIA/FOIA, no. 0000608232; Memorandum from William E. Colby (Deputy Director of CIA) to McGeorge Bundy entitled “Visit of General Chiang Ching-kuo,” September 19, 1963, NSA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1964, Document 9.

分官員相信即便美國與臺灣攜手摧毀目前已知的中共核設施目標，依然無法保證能夠完全根除中共境內所有已知或者未知的核設備，而此類行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與風險更難以估計，因而對於蔣經國前一年所提出的構想，並未給予確切回應。⁴⁷53年（1964）10月16日下午三時，中共首枚原子彈於新疆羅布泊地區成功試爆的消息傳出後，舉世震驚，儘管武器性能如何以及核質量多寡，仍有待進一步驗證，然不論如何，蔣介石第一時間悲觀地認定北京日後將可「以此作為恫嚇亞非國家與對所謂不結盟國家之投機者，大施宣傳，自將發生重大影響」，除擔心將對聯合國席次保衛戰帶來不利影響之外，也害怕臺灣民心士氣受到沉重打擊，因而指示「應設法宣傳，以免被共匪反宣傳而生疑懼之心理而已。」⁴⁸

中共核試爆的消息傳出時，蔣經國正在金門視察，從外島回到臺北之後，他的心情極度沮喪與痛苦，自記他躺在家裡床上休息時，「想及共匪核子試爆之所以發生，完全由於美國的姑息共匪和拘束我們的政策所造成，事已至此，而美國仍無悔悟之意，豈不可悲？」⁴⁹小蔣當然不會忘記一年之前訪問華府時向美方提出的籲求，卻遭對方置之不理，詹森總統立即比照該年初臺、法斷交危機發生之時的處理措施，立即派遣克萊恩火速馳援，前來臺灣向國府保證美國對臺協防承諾不會改變，蔣介石向克氏坦白表達他心中強烈的「困擾與恐懼」，抱怨數年來華府遲遲不接受臺北提議打擊中共境內核設施，實為一大錯誤，如今再多的解釋與保證都無法彌補亞太地區民心士氣所受到的強烈打擊。⁵⁰蔣經國則比父親更直率，在與克萊恩談話

⁴⁷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memorandum entitl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Nuclear Capability and Some ‘Unorthodox’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June 1, 1964, NARA, RG 59,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Records, 1963-64, Box 264;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memorandum entitled “Communist China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September 2, 1964, *ibid*, Box 254.

⁴⁸ 《蔣介石日記》，1964年10月17日。

⁴⁹ 《蔣經國日記》，1964年10月19日。

⁵⁰ 《蔣介石日記》，1964年10月24日、10月25日；Jerauld W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19, 1964,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NSA)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Collecti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no. NP01008; W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24, 1964, NSA,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時兩人一度發生激烈爭論，他批評美方政策失當，指責「美國人既愚蠢而又自大，可惡亦可憐」，談到後來竟然不歡而散，從寓所送走克萊恩之後，小蔣自忖美國未來將更加靠不住。⁵¹

平心而論，從臺灣的角度觀之，一個立即且直接的疑慮是美政府今後對於臺海局勢所持的態度將發生何種變化，簡言之，一旦北京決定使用原子彈「解放」臺灣，美國是否依然願意信守協防承諾，為了臺灣的安全不惜與中共進行核戰？美方雖不斷向國府要員強調繼續協防臺灣的決心，同時力陳「核試爆成功」與「成為世界核武強權」之間的差距，然而臺北黨政高層對於美方承諾皆有所保留。⁵²該年 11 月下旬，臺北同時有兩個重要集會，一是亞洲反共聯盟會議，二是中國國民黨建黨七十周年紀念與二中全會的召開，然而受到中共成功核試爆之影響，國府政壇上下皆瀰漫一股濃厚的失敗主義氣氛，蔣經國即自記：「今年十月可稱之為不吉之月，在國內有金門小艇之叛逃，雙十國慶飛機之失事，楊傳廣之失敗，以及馬晴山在日本之叛變，在國際上有英國工黨之勝利以及大陸上共匪之核子試爆，以上諸事對民心士氣皆有不和之影響，即以我個人而言，在情緒上因受到不斷的刺刺激而覺得痛苦與緊張，吾人生於此一時代，必須要有非常堅強的意志，否則幾乎一天亦活不下去。我希望國運從此好轉，但是亦要準備來忍受各種遠超過於過去之種種刺刺激。」⁵³對此種悲觀消沉感受最為直接者，莫過於蔣介石本人，為了準備兩場會議的講詞，他費盡心神，「尤其在此人心萎靡與反攻失望之悲觀氣氛下，更使竭盡心力加以挽救頹勢，振奮人心。」⁵⁴回顧歷史，民國 53 年（1964）秋天中共核試爆成功，可謂中華民國政府軍事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此事件之發展，讓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最高國策，終究成為一場沒有可能實現的美夢。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1964, Document 20.

⁵¹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0 月 24 日、10 月 25 日。

⁵² Jerauld W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28, 1964, NSA, Collecti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Document No. NP01028.

⁵³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1 月 2 日。

⁵⁴ 《蔣介石日記》，1964 年 11 月 28 日。

伍、彭明敏與「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民國 53 年（1964）國府當局發生在外交與軍事上的一連串沉重打擊，讓臺灣民心士氣跌至谷底，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翌年初的一份分析報告裡即指出，法國外交轉向、湖口兵變與中共核試爆成功，除了對國府當局聲望與政治正當性受到嚴重打擊，未來臺灣如果發生更大不幸事件，諸如蔣介石去世、臺北退出聯合國與軍隊再次出現兵變等，都將導致臺灣內部政局出現不穩定，誘發廣大臺灣本省籍民眾之怨憤，最終導致共產黨勢力對臺灣的滲透。⁵⁵面對來自各方的嚴重挑戰，部分島內本省籍有志之士不惜冒著威權統治下可能帶來的牢獄之災，已在醞釀提倡變革，其中受國民黨刻意栽培、曾是國立臺灣大學史上最年輕正教授與系主任、獲得「十大傑出青年」榮銜的臺籍菁英彭明敏，與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在思索臺灣困境與未來出路後，決定發表《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簡稱《自救宣言》），主張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接受共產黨統治，而蔣介石政權既不能代表中國，又不能代表臺灣，甚至不能代表國民黨，他們呼籲本省與外省人團結一致，共同建設一個新國家，成立新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並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交。《自救宣言》的出現讓國府權力正當性的敏感議題搬上了檯面，掀開了臺灣島內省籍問題的潘朵拉盒，並鼓舞日後海外臺灣獨立運動，可謂影響深遠。⁵⁶

從蔣經國如何在日記裡反映他對《自救宣言》案的看法，吾人可進一步探究他對於因此案而衍生的省籍問題，以及他內心如何認知與看待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該宣言草稿完成後，在印製過程中遭印刷廠老闆密告，民國 53 年（1964）9 月間，彭、謝、魏三人遭警備總部以叛亂罪逮捕，並於翌年初分別被判處八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彭案」發生後，蔣經國主觀認定此案乃美國人在幕後煽動本省人反對國民黨。當年稍早六月間，

⁵⁵ CIA Special Report, "Taiwan's Morale Problem," January 22, 1965, in Kesaris ed.,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1946-1976, reel 2.

⁵⁶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 年），頁 135-136；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頁 213-214。

自美考察歸來的國防部法規司長梅可望告訴小蔣，在美時他聽聞聯邦調查局內部正流傳一種說法：華府利用「學生」推翻南韓的李承晚，利用「和尚」推翻南越的吳廷琰，現在正準備利用「臺灣人」來推翻蔣介石，這番生動描述令小蔣心生警惕，認定「此乃一種警告，吾人應有所警覺，亦必須有所準備」，他認為「治臺最重法紀，法行而後知恩，有恩而法不彰，反啟本省人之反感與輕視。」⁵⁷

民國 53 年（1964）之際，小蔣注意到美國朝野人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關注臺灣的「省籍」問題，認為以往老美談論話題總是環繞在臺灣是否會成為「警察國家」以及蔣經國是否與中共謀和，然而近來論調則轉為本省與外省人互動關係，以及臺灣人是否反抗外省人。就在此案發生之前不久，時任農復會委員的蔣彥士自美歸來後又面告小蔣，當他拜訪艾森豪時，這位過去支持蔣介石的前總統竟然大多數時間都在探詢本省、外省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小蔣認定美方關注此議題「一定是不懷好意」。他還聽聞民間社會流傳的一些偏激與怪異論調，譬如稱臺灣人民「有一天會在中山堂公審蔣氏全家」、「將來蔣經國想逃亦逃不掉，一定會從飛機場捉回來」，小蔣驚訝此類言論竟也能傳到他耳裡，他雖不願多加揣測與理會，然而「此時此地總有人在作如此想，可不知之乎？」⁵⁸

民國 53 年（1964）9 月警備總部將彭明敏等三人拘捕的消息傳出後，立即引發海內外廣大關注，彭在《自救宣言》裡的主張與籲求，隨後更引來美國務院對臺灣法理地位、「兩個中國」與「一中一臺」等構想的區別以及利弊得失進行深入剖析，儘管美方檯面下對臺灣地位的研究，並未立即反映在官方政策上，不過對於臺灣未來情勢研判過程中「本省人」所扮演之角色，儼然已成為美方思考重點。⁵⁹「彭案」的發生除了讓小蔣痛批美國「積極煽動本省人反對政府，其言論非常露骨，其行動亦很具體」，更令

⁵⁷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6 月 10 日、6 月 20 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⁵⁸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9 月 12 日〈上星期反省錄〉。

⁵⁹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Subject: "Two Chinas" Versus "One China, One Taiwan," November 25, 1964, NARA, RG 5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ubject Files (1951-1978), Lot File 75D76, POL 32-1.

他對本省人的負面觀感油然而生；思索彭明敏十餘年來受國府刻意栽培，如今竟然有此主張，他不禁有感而發，認為許多臺籍菁英已在政治上獲得顯著地位，且在經濟上擁有財富，然而卻往往對政府「陽奉陰違」，這些人物在緊要關頭，除極少數忠貞人士外，其餘多不可靠，小蔣提醒自己，面對臺灣人必須保持謹慎，否則將出現「判斷上的錯誤」。⁶⁰

儘管在民國 53 年（1964）之時，蔣經國骨子裡對眾多臺籍人士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有所猜疑，然此刻臺灣整體內部政治情勢，已無法容許兩蔣父子隨心所欲地嚴辦所謂的「叛亂份子」，而是必須注意國際社會對此類政治案的觀感；小蔣即自記《自救宣言》案發生後，國民黨內主管外交的沈昌煥與宣傳工作的謝然之，「對彭明敏案所發表的意見，以及所持之態度，違背了原則，亦放棄了立場，乃是十足的政客作法，可嘆。」⁶¹甚至連當時駐美大使蔣廷黻都曾越洋來電，直接要求政府釋放彭明敏，讓向來對蔣廷黻尊敬有加的蔣經國，在日記裡痛罵國家有如此大使，「豈不可悲？」⁶²然而形勢比人強，當小蔣本人在逐漸脫離特務工作，從政治幕後走向臺前、為日後接班而鋪路時，他也必須開始留意自己的公眾形象，易言之，不論小蔣本人喜歡與否，努力經營、打入本省籍社群，贏得廣大百姓支持、信任與好感，已成了一門必修的課目。

爬梳小蔣日記內容，此時他確實開始注意自己在臺灣人心目中的印象；早在前一年（1963）秋天，蔣經國與一位名為劉衍的留美學生晤談時，得知某些「反動」留學生在海外臺灣社團散佈流言，稱他在「二二八事變」後自南京來臺，指揮屠殺臺灣人達十萬人之眾，劉衍坦白告訴小蔣，此種惡意宣傳在北美各地已逐漸發酵，小蔣聞後極為懊惱。⁶³民國 53 年（1964）春天，蔣經國又讀到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竇莫安（F. Tillman Durdin）一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舊報導，內容提到事變發生後，南京派兵來臺鎮

⁶⁰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9 月 27 日、11 月 21 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⁶¹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1 月 18 日。

⁶²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11 月 5 日。

⁶³ 《蔣經國日記》，1963 年 10 月 26 日〈上星期反省錄〉。

壓，估計有超過一萬名臺灣人遭殺害。⁶⁴檢視此篇報導原文內容，並未有隻字片語提及小蔣，然而他卻自記這位「反動記者」在報導中寫道事變發生後，「蔣經國立即來臺，決定採取報復政策，殺了一萬多臺人」。小蔣回憶當年他奉命隨白崇禧來臺撫慰，並向行政長官陳儀轉達應以寬大態度對待臺人，不可報復，而該篇報導內容卻與事實相反，他自認「事隔多年，我幾乎已將此事忘記，而敵人則用此事以作惡毒之反宣傳，造成臺人恨蔣經國之空氣，由此亦可看出敵人的『細心』以及存心之惡。」⁶⁵鑒於小蔣英文閱讀能力有限，吾人無法知悉其所讀的究竟是何種譯本，然而從此件小事可知，他極為在意外界如何看待他與本省人關係，如何設法改善臺人心目中對他的印象，已成為蔣經國一個嚴肅課題。

為了拉攏臺灣本省籍菁英並扭轉「特務頭目」形象，蔣經國可謂用心良苦；三年多前的民國 50 年（1961）春天，東京「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臺地下組織被情治單位查獲，接著同樣由廖文毅創立的「臺灣民主獨立黨」在臺地下工作委員會也遭破獲，廖的眾多親友皆遭軍法審判。⁶⁶此時小蔣出面招撫，透過行政院政務委員蔡培火、臺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徐慶鐘與總統府資政丘念臺等臺籍人物，積極勸說廖文毅放棄臺獨回來故鄉，又透過調查局向廖喊話，只要他肯回來，保證無條件釋放其親友，歸還沒收財產，並給予適當職務與地位。此心理戰果然發生效果，民國 54 年（1965）5 月 14 日廖文毅自東京搭機返臺，離開日本前他發表聲明：「決心放棄臺灣獨立組織活動，響應蔣總統反共建國聯盟號召，劍及履及，離日返臺，貢獻所有力量。」⁶⁷國府當局盛大歡迎廖「悔悟歸來」，蔣介石親自召見，安排他出任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⁶⁴ 竇奠安與其妻佩姬·竇奠安 (Peggy Durdin) 對臺灣暴動所刊出的幾篇報導，成為西方媒體披露「二二八事變」之始，參見：“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47, p. 4; “Terror in Taiwan,” *The Nation*, May 24, 1947.

⁶⁵ 《蔣經國日記》，1964 年 7 月 4 日〈上星期反省錄〉。

⁶⁶ 林樹枝，《白色恐怖 X 檔案》（臺北：前衛出版社，2010 年），頁 27-30。

⁶⁷ 李世傑，《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廖文毅投降始末》（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 年），頁 290-293；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四）》（香港：三聯書店，2017 年），頁 358-360。

投入故鄉的基礎建設，而廖的返臺也給海外臺獨運動帶來沉重打擊，以日本為根據地的其他臺獨人士如鄭萬福、吳振南等人隨後紛紛回臺，對國民黨宣傳帶來極大效益。⁶⁸

從蔣經國如何對待《自救宣言》案幾位主角的幕後插曲，吾人可進一步窺知，到了民國 50 年代中期之際，他多麼盼望著以開明懷柔形象，來博取更多臺籍菁英好感；民國 54 年（1965）年 2 月，彭明敏、魏廷朝與謝聰敏三人入獄服刑，當時正值農曆春節，小蔣得知魏廷朝向來侍母至孝，因在監獄裡無法返家省親，暗中派人將一千元臺幣（約今日之一萬兩千元）送交魏母手中，不料此事被傳出去，引發一陣爭議，小蔣自問此舉完全是出於同情心，然部份政壇人士卻將他這番好意視為對臺籍人士的「政治收買」而加以抨擊，「余對此並未作任何辯白，一切知之於心，足矣。」⁶⁹

在國際輿論壓力下，國府當局於民國 54 年（1965）秋天允許彭明敏特赦出獄，魏、謝兩人也各減刑一半，彭被釋放後，可以在臺灣各地行動並自由會客，但無法回臺灣大學任教，其行動也遭嚴密監控。翌年（55 年）4 月 23 日，彭突然被告知將獲蔣經國召見，他回憶此段經歷時稱，小蔣在救國團總部裡接見他，時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委員的李煥陪同，當彭快走進小蔣辦公室時，他透過玻璃窗瞥見蔣特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小心翼翼整理衣領，雙方握手寒暄後，蔣非常親切地問候彭的家人，閒話家常，並稱「很多人都非常關心你」，又問他「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忙的？」當彭回答希望能夠再回臺大教書時，小蔣臉上閃過一絲尷尬，轉向李煥問道：「有沒有與錢（思亮）校長談過？」同樣面露尷尬的李煥支吾其詞，連忙稱「我們會與他商量這件事。」⁷⁰

蔣經國在同一天日記裡對此次晤談經過，僅有短短三段話：「接見臺獨

⁶⁸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 年），頁 177-180；陳銘城，《海外臺獨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 年），頁 9-11；Gary M. Davison, *A Short History of Taiwan: The Case for Independence*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pp. 82-83.

⁶⁹ 《蔣經國日記》，1965 年 3 月 30 日。

⁷⁰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頁 217-218。

案之主要犯彭明敏，談談一般問題，在政治運用上似有收穫。」⁷¹蔣顯然把他與彭的會面視為政治上拉攏臺籍菁英的一環，且自認頗有收穫，彭本人即不諱言，這三十分鐘輕鬆且不拘束的談話讓他內心感受很複雜：「蔣經國本人似乎遠不如其照片所給人的印象那麼粗鄙，他的談吐頗帶溫暖，這在其父親唐突陳腐的問話中，是找不到的」，坦承小蔣的平實作風讓人感覺到他是一位比較有誠意的政治人物。⁷²

小蔣致力爭取廣大本省民眾認同與建立開明形象的努力，是否稱得上成功，答案或許見仁見智，然在外人眼中，此番用心似乎仍無法消弭一般百姓對他的猜疑與負面觀感；美政府注意到小蔣欲以革新與效率建立個人威望，然他設法與臺籍人士交好的努力只稱得上是「表面功夫」，在廣大本省人心目中，小蔣依然是「深不可測的謎」，省籍衝突仍無法消弭。⁷³當民國 50 年代走入尾聲之際，華府還認定一般臺灣人早已把蔣經國與污穢的特務工作聯想在一起，評價他應為「白色恐怖」所犧牲的眾多本省菁英負起責任，小蔣在權力接班過程中可能面臨來自本土勢力的挑戰，讓國務院不敢掉以輕心，對臺灣政局出現不穩時美方如何因應的沙盤推演，也成了華府一項可做卻不能說之事。⁷⁴ 1964 年秋天《自救宣言》案的發生，不但開啟日後有關臺灣民族自決以及建立起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認同之風，同時也促使準備接班的蔣經國，進一步深思本土化與省籍議題，為其主掌國政後推動的本土化運動奠下了基礎。

⁷¹ 《蔣經國日記》，1966 年 4 月 23 日。

⁷²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頁 218-219。

⁷³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Subject: US-Japan Policy Planning Talks: Taiwan, November 28, 1966, NARA, RG 5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ubject Files (1951-1978), Lot File 72D145; 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Summary of Recent Development on Taiwan, September 6, 1967, *ibid*, Lot File 72D140.

⁷⁴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U.S. Policy towar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April 24, 1968, NARA, RG 5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ubject Files (1951-1978), Lot File 72D140.

陸、建設臺灣之始：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儘管發生在民國 53 年（1964）間外交、內政與軍事上的諸多事件，對蔣介石所領導的國府當局帶來種種嚴峻挑戰，然就蔣經國個人政治生涯發展而言，53 年（1964）顯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正面轉捩點，該年 3 月 16 日，小蔣正式接任國防部副部長職位，如前所述，此時部長俞大維因健康欠佳且長時間不在國內，蔣經國已實際負責部務，並於十個月後繼俞擔任部長職。小蔣接下國防部副部長職位之時，他仍兼任行政院退輔會主任委員一職，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接任人選，小蔣此一兼職狀況直到該年 6 月底才結束，由趙聚鈺繼任，當小蔣終於準備把八年的退輔會工作移交出去後，他內心有極深之感慨：「早想辭輔委會主任委員之職，因無適當人選可接此事，故尚未提出辭呈，自問決無非我不可之意，亦無任何權利觀念，而完全是因為責任心之所在，同時為了情感而不忍拋棄這批忠厚誠實而生活在痛苦中的榮民，不過仍將於短期內辭去此職，得能集中精力於國防部」，七月一日，當他結束交接離開退輔會辦公室之時，可謂「百感交集，心中依依」。⁷⁵

蔣經國應當無法忘記，八年前他是如何在極困難的環境下，開始推動退輔會業務。民國 38 年（1949）國府撤退來臺時，帶來 50 萬名無眷單身官兵，以及 10 餘萬有眷軍官和老士官，到了民國 40 年代中期，這些外省籍官兵平均年齡已達三十八歲，無法留在部隊繼續效力，一旦退伍離開軍隊，不但缺乏謀生能力，又無家可歸，勢將給社會帶來嚴重問題。除了隨政府遷臺部隊的老化問題之外，韓戰結束後臺灣接納來自朝鮮半島、滇緬邊境、越南富國島與大陳島總數達八萬名的反共義士、游擊隊與其眷屬等，除小部份被編入特種部隊繼續替國家效命外，其餘撤退來臺龐大人員的安置作業，亦是一項棘手任務，蔣介石如何妥善處理此問題，各國政府都在密切關注。⁷⁶43 年（1954）秋，行政院設立退輔會，由臺灣省政府主席嚴

⁷⁵ 《蔣經國日記》，1966 年 5 月 30 日、7 月 1 日。

⁷⁶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Memorandum, November 2, 1954, no. 794A.5-MSP/11-254, in Michael Davis ed.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Republic of

家淦兼任主任委員，他從臺灣銀行借款五百萬臺幣作為開辦會務經費，並向美方爭取從美援款項中，撥出四千二百萬美元投入退除役官兵安置工作。

77

民國 45 年（1956）春，臺灣省政府由臺北遷往南投縣中興新村，嚴家淦分身乏術，無法兼顧退輔會業務，蔣介石決定由其子出任代理主任委員之職，負責推動實際會務，蔣經國對此項新任務信心滿滿：「任何工作，凡父親認為有必要而交辦者，必將接受而且努力以赴之。」⁷⁸就個人政治生涯發展而言，小蔣接掌退輔會有幾項重要意義，首先，此位置提供一個平臺，讓他得以跨出隱蔽神秘的特務圈，結交中央情報局以外的其他美國駐臺人員，對於消弭老美對其背景疑慮、進一步認識這名頭號「謎樣人物」，當有所助益。小蔣自記接掌退輔會不久，因業務需要而前往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拜會署長卜蘭德（Joseph L. Brent）時，竟是國府遷臺七年以來，他首次踏進美大使館以外的美國駐臺機構，彼此之間的嚴重疏離，由此可見。⁷⁹為審核退輔會各項計畫及預算，美方委託一家「福瑞」（George Fry）顧問公司處理相關業務，在與「福瑞」美籍顧問往來後，小蔣得知美駐臺各單位彼此之間，存在許多矛盾與人事糾葛，過去以為只有國民黨自己有複雜的人事問題，如今知悉「洋人問題」亦不少，他頗覺有趣，不論如何，蔣自認接掌退輔會後，「對於各方面的中外人士將有很多的機會，互相認識與往來，此為今後事業開展中之重要因素與條件」。⁸⁰

其次，退輔會工作讓蔣經國有機會接觸美援經費實際運作情形，瞭解

China 1950-1954 (以下簡稱 Formosa 1950-1954)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 1986), microfilm, reel 6;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Foreign Office Records (以下簡稱 FO), 371/120864 FC1011/3, Formosa: Annual Review for 1955, enclosed in British Consulate in Tamsui to Foreign Office, March 9, 1956.

⁷⁷ “China (Formosa) P.L. 480 Title I Program,” State Department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September 20, 1955, reproduced in DDRS, no. CK 2349599327.

⁷⁸ 《蔣經國日記》，1956 年 3 月 20 日。

⁷⁹ 《蔣經國日記》，1956 年 5 月 1 日。

⁸⁰ 《蔣經國日記》，1956 年 5 月 4 日、5 月 5 日〈上星期反省錄〉。

財政預算制度以及中央與地方經濟建設等相對陌生的領域，對於日後主持臺灣經建大計與決策，當有所啟發，只是退輔會時期這段摸索學習經歷，並非總令他感到愉快。韓戰爆發後，美援的到來穩定了臺灣社會，大幅促進島內經濟建設發展，民國 40 至 54 年（1951-1965）間，臺灣平均每年獲得約 1 億美元經濟援助，其中尚不包括超過此數字三倍以上的軍事援助。⁸¹大陸時期國府為妥善運用美援，於行政院設立「美援運用委員會」（美援會）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政府遷臺後除上述單位繼續運作之外，行政院又設立「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來協調美援與政府預算之配合，相較於其他內閣部會，如上三個單位擁有極大自主性，其預算與所屬中方官員薪資甚至直接來自美援相對基金。⁸²美政府雖重新恢復對蔣介石援助，然為避免重蹈大陸失敗之覆轍，其對臺北的監督與管控力道極強，不斷施壓國府建立一套合理預算制度，制定可行的經濟政策，讓每一分錢都能有效投入於改革建設，這些名義上隸屬於行政院的部會，即是美方施加影響力與管控國府預算的「白手套」，華府還透過美援會在臺成立一個總帳戶，由經安會授權後撥款用於國府各項建設，而老美在內部文件中，毫不避諱談論如何透過這些部門向蔣介石施壓，達到美方所認可的美援目的。⁸³

蔣經國接掌退輔會後，開始領教到美方對其業務的強硬態度。在小蔣認知裡，安置退除役官兵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具有長遠性，為長治久安計，他擬從兩方面著手，一是開築東西橫貫公路，藉由打通臺灣山脈東西

⁸¹ Neil H.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7), pp. 40-41; 段承璞主編，《臺灣戰後經濟》（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年），頁 109-111。

⁸²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p. 60-64;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出版社，1985年），頁 47；瞿宛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年），頁 234。

⁸³ Karl Rankin to State Department, top secret, January 10, 1953, no. 794A.5-MSP/1-1053, Formosa 1950-1954, reel 4; Activity Report from Month of November 1953, prepared by MAAG Formosa, December 24, 1953, no. 794A.5-MSP/12-2453, *ibid*, reel 6; Rankin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Appraisal of Effects of United States Aid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Formosa, October 14, 1954, no. 794A.5-MSP/10-1454, *ibid*.

兩端的浩大工程，讓退除役官兵龐大的勞動力獲得紓解利用，二是安置退除役官兵的就業、就養與就學，具體作為包括在各地開闢新農場、牧場、林場、漁池與果園，協助榮民轉業以自給自足，並於臺北石牌興建一座榮民總醫院，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最後在臺灣各地設置多處「榮民之家」，讓日漸老邁的官兵得以安享天年。⁸⁴蔣經國認定這些長期性工作必須先在經費上妥為籌劃，因而向安全分署要求將美方已答允的四千二百萬援助款項中尚未動用的部份，依匯率計算差額後，一次性以新臺幣撥付退輔會成立一個安置就業基金，如此可確保日後經費來源無虞。然而美方對此卻頗有疑慮，一來該援助款項原本準備用於協助臺灣進口計畫器材，以及進口物資並出售，藉以產生臺幣，二來美國本身並無協助退役軍人就業輔導制度，無法理解小蔣的構思與規劃，美方又對退輔會所提各項醫院、榮院與農牧場等大型興建計畫，以嚴格把關的態度百般刁難，遲遲不願核撥經費，讓亟待能有一番作為的小蔣為之氣結，倍感挫折，民國 45 年（1956）春、夏之交，雙方溝通已出現嚴重障礙，蔣多次在日記中抱怨他受盡洋人之氣，難以忍受。⁸⁵

該年 8 月 21 日的夜晚，小蔣應邀出席由卜蘭德主持的工作會報，介紹退輔會各項計畫並尋求美方支持，不料竟遭出席的安全分署人員公開嘲諷、指責與批評，令他下不了臺，氣氛尷尬。遭老美難堪侮辱的小蔣，當晚因過於氣憤而未得安眠，令他更為光火的是，他發覺美方對他羞辱，背後竟有美援會秘書長王蓬等中方人士煽風點火，憤怒之餘，多次痛罵王為「洋奴」、「流氓」與「卑鄙無恥」，而美方對於退輔會業務的控制與干涉，也不禁讓蔣感慨國與國之間只有利害，毫無道義可言。⁸⁶美方此時為何會有如此

⁸⁴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編，《十年來之輔導工作》（臺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1964 年），頁 3-6；何智霖、薛月順編，《蔣經國與臺灣：相關人物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10 年），第二輯，頁 110-111。

⁸⁵ 《蔣經國日記》，1956 年 5 月 30 日、6 月 11 日。美援與退輔會之間的複雜關係，另參見：趙既昌，《美援的運用》，頁 223-239；林炳炎，《保衛大臺灣的美援（1949-1957）》（臺北：作者出版，2004 年），頁 312-322。

⁸⁶ 蔣經國遭美國安全分署人員批評之記載，參見《蔣經國日記》，1956 年 8 月 21 日、8 月 22 日、8 月 23 日、8 月 27 日、8 月 31 日〈上月反省錄〉、9 月 5 日、9 月 8 日、9 月

不友善態度？卜蘭德向華府呈送的報告裡，批評臺方所提重大建設計劃多由政府主導，此類由官方掌控的經建方案，實有礙行政效率之提升，而且管理監督成本將占去美援中可觀之比例，無法真正達到協助臺灣整體經濟發展與轉型的戰略目標。⁸⁷美駐華大使藍欽也指出，理想的美援模式應當是能夠鼓勵本地、外國與海外華僑前來臺灣私人投資，由此帶動自由經濟制度，而非讓國府一味依賴美援推動由政府主導的大型建設計劃，畢竟美援將有結束之一日。⁸⁸美方對於退輔會所提各項方案的猶疑態度，因而不令人意外。

自民國 46 年(1957)起，退輔會與安全分署之間的磨合逐漸有所改善，美方對該會所提各案的細節雖然多所質疑，然在小蔣多次陪同美方人員上山下海，前往橫貫公路等地視察之後，老美們開始理解這些建設的重要性，以及國府在經費使用上並無不當之處。坦白言，退輔會業務既然有求於美方，彼此發生溝通不良或認知差距乃在所難免，安全分署對各計畫著重審核，步驟細密，按部就班，執行過程中經常檢討，事後又嚴密稽核考查，雖讓中方人士心生不耐，然每當蔣經國心情平靜下來後，也自認對方許多批評並非無矢放的。⁸⁹從推動退輔會業務過程中，小蔣也領悟到爭取預算時，應避免主觀與本位主義；47 年(1958)秋天，美方不願具體承諾是否提供完成橫貫公路所需之剩餘經費，小蔣情急之下，轉而向臺灣省政府與行政院爭取預算，此刻他才理解國家財政困難與政府施政之不易，每一分錢的運用都必須從整體考量，無法偏好某一部會。⁹⁰多年後，當蔣本人成為臺灣財經總舵手時，他還將進一步體會到僚屬之間各自從本位主義出發、彼此

9 日、10 月 31 日〈上月反省錄〉。

⁸⁷ Report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Discussions between United States Officials in the Far East and Clarence B. Randall and Associates: Taiwan, by Joseph Brent, December 1956, reproduced in DDRS, no. CK 2349279746.

⁸⁸ "United State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Free China," by Karl Rankin, December 1956, reproduced in DDRS, no. CK 2349599327.

⁸⁹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頁 237-238。

⁹⁰ 《蔣經國日記》，1956 年 9 月 23 日、1958 年 9 月 20 日、9 月 22 日、9 月 27 日、12 月 11 日、12 月 15 日。

爭執不下所帶來的苦惱。

八年退輔會工作對蔣經國政治生涯第三個重要意義，在於這段經歷提供意想不到的機會，使他得以踏遍全臺灣各角落，親身體驗這塊島嶼的自然與人文風情，讓他可以「接地氣」、聆聽小老百姓的心聲，從而深刻理解並開始愛上這片土地，率領榮民開鑿橫貫公路以及退輔會在各地推動各項基礎建設，讓小蔣得以將足跡踏入臺灣最偏遠的地方，將觸角深入社會最底層角落，體察民隱，瞭解民之所需，同時也反省自己的處境。從民國 45 年（1956）6 月政府決議由退輔會主導此案，直到 49 年（1960）5 月橫貫公路正式開通為止，3 年又 9 個月施工期間，在當年交通與生活條件極度不便的情況下，小蔣曾 21 次前往實地考察，尤其在施工最初二年的艱困階段，他平均每六星期就從臺北深入中央山脈，與數千名榮民、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在克難環境下一起作息，一個意外的收穫是讓他得以一窺人煙罕見的祕境；45 年（1956）夏，小蔣率隊自臺中谷關入山進行首次探勘，他沿著碧綠、合歡兩溪抵達關原大草地，再沿立霧溪向東步行，最後從花蓮太魯閣出山，這九天與世隔絕的旅程，險象環生，幾次遇到大坍方，也經歷斷水之苦，並曾於一日之內步行危險山路二十五公里，卻也因此得以親睹他所讚嘆「來臺後所看見的最美之風景。」⁹¹

數次勘察之後，蔣經國不禁愛上了隱居深山、與榮民一起生活的清靜日子，並對臺北政壇的一切心生厭惡反感，民國 46 年（1957）春天「劉自然事件」反美暴動後，小蔣成了眾矢之的，此後他更把視察公路業務當作遠離政治喧囂、舒緩精神壓力的一劑良方。該年 7 月下旬他在山裡視察時，與六百多位以「生產作業總隊」為名義前來支援工程的監牢犯共處一地，對他們講笑話，舉辦晚會同歡，並到各處慰問「待他熱情有如家人」的築路榮民，他自記山中六日，接觸到用機器修路的榮民，養肺病的退役官兵，即將入山的救國團團員，在工廠裡做工的大陳義胞，協助背運行李的原住民，公路局的工程師與測量人員，以及協助築路的犯人，「他們在過最痛苦

⁹¹ 《蔣經國日記》，1956 年 6 月 29 日、6 月 30 日、7 月 1 日、7 月 2 日、7 月 3 日、7 月 4 日、7 月 5 日、7 月 6 日、7 月 7 日。

的生活，在做最有意義的工作，我多同他們接觸一次，多認識一分人間之真情，亦多得到一次教訓，亦是我最大的一次收穫。」每當結束視察準備返回臺北時，心中即開始生起煩惱苦悶，彷彿有如「從自然的天地開始進入一個人間的罪惡世界。」⁹²此種思緒，直到他當上總統，依然沒有改變。

民國 48 年（1959）11 月 1 日，遠東地區規模最大的榮民總醫院正式落成啟用，翌年 5 月 9 日東西橫貫公路正式通車，此兩者被視為蔣經國退輔會任內最重要成就，其他諸如福壽山農場、棲蘭山林場、花蓮東部開發處所轄各墾區、農場與職訓中心等，也因成果顯著而成為訪臺外賓與僑胞參觀的焦點行程，無形中對提升小蔣聲望有所助益，他本人不諱言，曾多次在視察各單位時因受到老百姓真誠歡迎而感動，國際間反應亦頗正面，英國駐臺外交官對橫貫公路正面評價稱，此路開通後勢將為臺灣過去許多未開發地區，帶來新的經濟發展與機會。⁹³美國安全分署為表示善意與敬意，亦於 50 年（1961）主動告知蔣經國，未來退輔會援助款項手續一切從簡，與美方對其他接受美援單位的嚴格審查態度，形成強烈對比，更與小蔣主事之初的不友善，有著天壤之別。⁹⁴

微妙的是，儘管在蔣經國主持下，退輔會對臺灣各地建設做出不少貢獻，獲得許多掌聲，然這些成果與付出，終究未能扭轉老美的主觀偏見，易言之，不論小蔣如何努力推動建設，在美方眼裡他依然被歸類於國民黨保守威權勢力，不但掌控情治大權，還是父親反攻大陸國策最忠實擁護者，堅持國府應繼續維持龐大國防預算。此種形象，和主張改革、務實推動經濟建設而有助於降低國府「軍事性格」的技術官僚，形成一個鮮明對比。⁹⁵美方此種評價是否公允，見仁見智，然冷戰高峰時期華府對臺政策目標本

⁹² 《蔣經國日記》，1957 年 7 月 23 日、7 月 24 日、7 月 27 日、〈上星期反省錄〉、1958 年 4 月 22 日。

⁹³ FO 371/158461 FCN1011/1, Formosa: Annual Review for 1960, enclosed in British Consulate in Tamsui 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7, 1960.

⁹⁴ 《蔣經國日記》，1961 年 12 月 23 日。

⁹⁵ Stephen G. Craft, *American Justice in Taiwan: The 1957 Riots and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pp. 20-23; *Ralph N.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2-43.

身即帶有某種矛盾性，一方面積極提供軍援，將臺灣打造為圍堵共產勢力的堅實堡壘，另一方面又支持鼓勵國民黨務實派掌權，藉推動經濟發展來降低臺海之間的軍事風險。1954年夏，財經背景出身的俞鴻鈞出任閣揆，不少美方所欣賞與熟識的財經專家紛紛入閣，美政府掩不住欣喜，相信愈多具有處理美援經驗的技術官僚進入政府體系，對臺灣整體發展愈加正面。⁹⁶到了民國46年（1957）春，華府決策圈雖已注意到執行援臺政策過程中此種矛盾性，然對於如何化解此種矛盾，卻莫衷一是。進入民國50年代以後，美政府此種鐘情於財經技術官僚治理臺灣，藉以沖淡國府軍事色彩的傾向，仍持續不變，凡與以陳誠為首的務實派官僚體系唱反調者，幾乎無可避免被美方歸類為「保守派」，並視其為妨礙臺灣長遠發展與穩定的絆腳石。⁹⁷

民國53年（1964）7月，蔣經國將退輔會業務交棒，開始專注於攸關臺灣安危的國防大政，此刻他正大步邁向政治舞臺最前端，接受民意洗禮與輿論檢視，為日後接掌國政挑戰而準備，然而此前八年相對未受到重視的退輔會工作經歷，卻是檢視與評價小蔣在臺治理一段不可被忽略的重要過程，退輔會的歷練，可說是蔣經國民國20至30年代贛南時期地方父母官情懷的延續，也是民國60年代他塑造在臺親民愛民、民胞物與形象的重要起點，吾人回顧臺灣在其治下經濟開始起飛之時，不應當忘記早年退輔會的工作對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⁹⁶ “Report on the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in Formosa, First Half of 1954,” July 21, 1954, no. 794A.5-MSP/7-2154, Formosa 1950-1954, reel 6. 有關美政府透過經援強化對臺政策掌控與培植「親美」技術官僚之討論，參見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臺北：自立晚報社，1990年），頁218-230。

⁹⁷ Briefing Information for President Eisenhower’s Far Eastern Trip: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June 6, 1960, reproduced in DDRS, no. CK 2349005811; CIA Office of Central Reference, Biographical Register, “Ch’en Ch’eng,” July 1961, in Kesaris ed.,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1946-1976, reel 1.

柒、結語

民國 53 年(1964)的蔣經國日記內容，除呈現出中華民國政府在外交、內政與軍事上所遭遇的嚴厲挑戰，也透露蔣介石因早年私人感情生活所帶來的後遺症，同時揭示小蔣本人在諸多問題上的內心想法，日記內容雖是小蔣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對許多重要議題第一時間的反應與看法，卻也映照出國府領導階層（兩蔣父子）與其治下國政上的深層問題。陳潔如回憶錄的出版，雖然在蔣經國等人努力下胎死腹中，然此事件所突顯出來的，是威權時代國府當局對於蔣介石神聖形象之塑造與維持，並非不須付出極昂貴之代價，38 年（1949）後蔣介石「民族救星」與偉人形象的塑造，乃在於維繫國府對臺統治與權力正當性，然而一旦威權褪色，民主潮流之風開始吹起，在轉型正義的帶動下，此種形象之崩潰也必將更加徹底，時至今日，臺灣社會「去蔣化」運動方興未艾，並引發諸多爭議與討論，回顧 53 年（1964）國府當局因陳潔如回憶錄內容恐將出現對蔣介石形象不利之內容，而不惜一切代價欲加以封殺，吾人或許能從中得到一些歷史啟示。

民國 53 年（1964）法國承認北京以及日本政府對中國大陸採取務實政策，可說是國際社會對於蔣介石光復大陸最高國策不信任的強烈展現，也是 38 年（1949）以來國府拜國際冷戰體系結構下所獲致之「中國代表權」虛幻表象出現鬆動的跡象，由於中共隨後因文化大革命而自陷內亂孤立，讓臺北代表全中國的外交地位得以繼續維持數年，然一旦中共內部情況穩定下來，並且決定在對外政策上改弦易張，或者國際政治格局出現結構性翻轉，則國府外交崩潰之勢也將無法避免。53 年（1964）的中華民國政府看似仍處在外交的巔峰，然該年初發生的兩起外交危機，卻也已埋下日後外交逆流之遠因。

伴隨著民國 53 年（1964）初外交劣勢所引發的「湖口兵變」，以及部隊普遍老化與腐朽，讓此時退守臺灣達十五年之久的國軍力量出現危機，此時開始主導臺灣國防大計的蔣經國，在日記中充分展現出他對此問題的憂心與焦慮，並對於能否實現蔣介石反攻大陸最高國策，發生信心上的動

搖，而該年 10 月中共成功進行核試爆，則是讓臺北發動軍事反攻的可能性，自此變得微乎其微，一旦中共擁有核武，盟邦美國是否真願意為了臺灣的軍事行動而與北京展開核戰，成了國府高層普遍的疑慮。回顧歷史，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放棄以武力收復大陸的政策，要到民國 60 年代之後才出現，然而 53 年（1964）兩岸之間軍事發展之消長，已預示著蔣介石一心一意期盼收復大陸的夢想，無從具體實現。

民國 53 年（1964）9 月彭明敏等三人因欲發表《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而遭到國府以叛亂罪逮捕，透過蔣經國在日記裡對此案之看法，吾人得以進一步窺知小蔣如何認知與看待臺灣人已及臺籍人士所發起的民主運動，儘管此時對臺籍菁英依然存有懷疑，然整體形勢之發展，又讓逐步準備接班小蔣必須致力於在廣大本省人士之中建立起較為開明之形象，以爭取更多的支持與認同。國府政治本土化工程，要等候臺灣外交面臨風雨飄搖、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之後才正式啟動，然彭明敏之被捕，可謂誘發臺人政治覺醒之重要轉折，此閘門一開啟，往後二十年臺灣政治格局與走向可說大勢已定，再無回頭路。

最後，就蔣經國本人政治生涯而言，民國 53 年（1964）亦是一個關鍵時間點，他在該年卸除退輔會主任委員職務，主掌臺灣國防大計，為日後接班而成為國府政治舞臺上的要角之一，然在此之前他於退輔會任內所推動一系列的基礎建設服務，儘管其對象以外省籍退除役榮民為主，這段長達八年的工作經歷，讓蔣經國得以接觸他所不熟悉的經建領域，踏遍全臺灣各角落，深刻理解這塊未來他將要領導的土地，並成為民國 60 年代以後其親民愛民形象塑造之起點。

透過蔣經國民國 53 年（1964）日記的爬梳研析，吾人從其內容看到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之後所面對的挑戰與瓶頸，以及領導階層對這些問題內心的真實反映，相信對於吾人理解戰後臺灣整體歷史，應當有所助益。